



引用格式:于海洋,曹雪森.后特朗普时代美日同盟战略分歧探析[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6):44-54.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6.006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6-0044-11

# 后特朗普时代美日同盟战略分歧探析

## Strategic discrepancy in the US-Japan alliance in the post-Trump era

于海洋,曹雪森

YU Haiyang, CAO Xuemiao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62

**摘要:**美日同盟战略分歧包括两个维度:一是美日对对手国中国的战略分歧,主要体现在对华战略目标和实现路径上;二是美日对同盟内部事务的战略分歧,主要体现在同盟角色定位、自主性和防务责任分担上。美日同盟战略分歧的成因主要包括时代背景变化、战略思维差异、经济实力差异和地理位置的不同。基于遏制中国的共同需要,美日也尝试在多方面协调分歧。在同盟对外战略上,明确对华指向并在多个议题上保持对华态度一致;在同盟内部战略上,在美日印澳四国安全机制和美日韩三边关系等多边和三边框架下强化美日同盟,并默许日本发展与美国其他盟友的关系。

**关键词:**

后特朗普时代;

美日同盟;

战略分歧;

分歧成因;

同盟协调

[收稿日期]2021-07-30

[作者简介]于海洋(1979—),男,吉林省长春市人,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战略理论与战略决策;曹雪森(1998—),女,河南省商丘市人,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联盟政治理论。

1951年,美、日双方签署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宣告美日同盟的诞生。美日同盟作为美国维护其亚太地区利益、遏制中国和苏联(俄罗斯)的工具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斯蒂芬·沃尔特的“威胁制衡论”,同盟的形成是为了制衡威胁<sup>[1]</sup>,美日同盟的形成主要是为了制衡苏联在亚太地区的扩张,因此在冷战时期,美日在安全和政治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冷战结束后,苏联的威胁消失,美日两国在经贸领域竞争性的一面凸显,美日同盟经历了“漂流期”,很大一部分美国人担心日本对美国的经济威胁,“日本威胁论”一度盛行。在短暂的“漂流期”后,美日同盟在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经历了三次调整后更加成熟,《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适用范围从最初的专守防卫转变成了所谓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使美日同盟成为了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同盟<sup>[2]</sup>。但在这一阶段,美日并没有彻底解决经贸领域的摩擦问题,双方还在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朝核问题、历史问题和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产生了不少分歧。

特朗普政府时期,因两国领导人的观念碰撞以及日本对提高自身自主性的追求,美日在经贸、国际秩序重建、驻日美军费用、对华政策等方面龃龉不断,分歧加剧。后特朗普时代,拜登在上任之初就将修复和强化美日同盟作为重大事项,但两国在对华战略上仍存在分歧,在经贸、防务等议题上的分歧也有待进一步解决。本文拟就美日同盟战略分歧及其成因进行探讨,并给出美日同盟战略分歧的当前发展现状的全景图。

## 一、美日同盟战略分歧

总的来看,美日同盟战略分歧表现形式多样,其分歧主要表现为对内、对外两个方面。

### 1. 美日同盟战略分歧的维度

对于联盟的定义,学术界并无一致定论,但

在联盟研究者的叙事中,联盟都与军事和安全有关。例如,格伦·斯奈德将联盟明确定义为,联盟是指使用(或不使用)军事力量的正式国家集团,旨在维护成员国安全或扩大其权势,反对特定的其他国家,无论这些其他国家是否被明确确定<sup>[3]</sup>。联盟条约与义务条款数据库则将联盟定义为,联盟是由至少两个独立国家的官方代表签署的书面协议,包括承诺在发生军事冲突时帮助盟友,在冲突时保持中立,避免发生与他国的军事冲突,或在发生可能造成军事冲突的国际危机时进行协商或合作<sup>[4]</sup>。美日同盟本质上是军事同盟,而非经济同盟抑或其他议题同盟,因此,本文也主要在军事同盟语境下对美日同盟进行分析,而不将美日关系语境下的美日经贸、国际秩序重建等分歧列入分析范围。

“战略分歧”的定义因“战略”的定义不同而难以统一,国家间的战略分歧是围绕国家间关系的关键性结构要素(如安全政策、地缘构思、同盟治理等)的战略层级矛盾而生成并加剧的<sup>[5]</sup>。就联盟战略分歧而言,本文采用周建仁的战略分歧定义,即“同盟成员国在同盟运行相关重大事项上的不同意见”。周建仁<sup>[6]</sup>认为,战略分歧具有两个维度:一是零和性战略分歧,即成员国存在对同盟主导权的争夺;二是分配性战略分歧,即成员国在如何应对同盟所针对的主要敌人上存在根本战略分歧。分配性战略分歧对应的是一些策略性的分歧,与零和性分歧相比较,其冲突性相对较弱。成员国在改变现状上有共同利益,但是在分配共同利益时存在利益冲突,即成员国都能从合作中获益,但是为了自身利益都希望采取自己偏好的策略。美日同盟战略分歧当属于后者。联盟战略分歧包括联盟对外战略分歧和联盟内部战略分歧两个维度的分歧,即联盟成员与对手国之间的分歧和联盟成员之间的分歧。

## 2. 美日同盟对外战略分歧

美日同盟对外战略分歧主要体现在双方针对中国的战略差异上,两国均依据自身战略利益和诉求来构建对华战略,在保持对华战略总体一致的前提下也存在“游离”情况。

在当前国际社会出现国际秩序重组变革趋势的背景下,中国抓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不断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不断前进;而美国因实力相对衰落,上演着在“机会窗口”<sup>\*</sup>前针对中国崛起进行恶性竞争的剧目。特朗普政府时期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拐点,其对华战略由接触加遏制转向以遏制为主。民主党人拜登上台后,将中国看作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是“最严峻的竞争对手”,虽然美国两党对华的具体政策和手段不同,但其在对华态度和立场上高度一致,即都主张对华强硬、遏制中国发展,通过分析拜登上任以来的言论可以看出其对华战略的大致脉络与走向。

在同盟目标方面,距离的遥远加之核武器的毁灭性,使得中美两国爆发全面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同化对方意识形态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故中美两国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综合实力的竞争。拜登将中国实力的提升视为对美国全球霸权的最大挑战和威胁,不仅在安全领域持一贯的强硬态度,还旨在遏制中国的综合实力上升。在上任后的首场总统新闻发布会上,拜登表示:“中国有一个总体目标,我不批评他们这个目标,但他们有一个总体目标,就是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我任期内这不会发生,因为美国将继续发展壮大。”<sup>[7]</sup> 白宫在2021年3月3日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

指出,特别是中国,已经迅速变得更加自信,它是唯一有潜在能力整合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力量,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提出持续性挑战的竞争者<sup>[8]</sup>。可见,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目标是与中国进行实力竞争并继续拉拢盟友遏制打压中国。然而在日本看来,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威胁到其生存安全,而中日紧密的经贸关系又为日本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日本的对华战略目标主要聚焦于两方面:一是依靠美国保障和维护自身生存安全,在诸如领土纠纷等问题上借助美国的支持与中国对抗;二是获取对华经贸利益,在双边和多边框架下谋求经济利益。美日两国的战略利益和诉求存在差异,其对华战略目标也不尽相同。

在实现路径方面,尽管拜登的对华战略手段有别于特朗普的全面打压,承认在气候变化、全球安全卫生等全球治理议题上需要同中国合作,倾向于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领域进行重点打压<sup>[9]</sup>,但在短时期内其对华战略总体上会延续上届政府的政策。总的来看,拜登政府将在经济、科技、军事、价值观、规则和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与中国进行竞争,美日对华战略分歧主要体现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在经济方面,拜登延续了上届政府的对华关税政策,其在竞选时就提出美国要加强对联盟的重视,“以反击中国在经贸问题上的侵略和掠夺”<sup>[10]</sup>,其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也表示美国要“联合世界民主国家的经济力量,以打击滥用经济行为并减少不平等”<sup>[11]</sup>。在科技方面,拜登将科技竞争作为对华竞争的重中之重,可能“采取所谓‘小院高墙’<sup>\*\*</sup>策略,缩小技术封锁范围,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保护”<sup>[12]</sup>,继续在科技方面进行脱钩。然而对日本而言,随着日中之间的

\* 范·埃弗拉将“机会窗口”作为相对衰落国家倾向于战争的原因之一,但在和平前提下,衰落国家抢抓“机会窗口”的策略形式体现为战略竞争。

\*\* “小院高墙”意指要有选择地界定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并以更有力的措施保护这些技术。

实力差距越来越大,日本逐渐认识到自己没有能力与中国进行竞争,也不认为中国的经济、科技实力增长是对日本的根本性威胁,最根本的威胁仍是安全和领土问题。从日中经济关系来看,日本在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后,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对中国的市场更加依赖。因此,日本会继续对美国的对华经济和科技遏制政策进行选择性的背离,目前不太可能在经济领域完全放弃国家利益助美遏华。由于没有实力与中国直接对抗,日本只能在国际场域阻挠中国,利用多边场合和机制挑动或制造各种涉华议题<sup>[13]</sup>,渲染“中国威胁论”。拜登虽然表示在出台对华战略决策之前将会与盟友进行磋商,但其最终在对华各个领域的政策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很小,美日对华战略的分歧将随着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明朗而逐渐凸显。

### 3. 美日同盟内部战略分歧

美日同盟作为军事同盟,其内部战略分歧主要体现在防务安全领域。首先,在同盟目标和角色方面,冷战后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是搭美国的安全便车,而是主动分担防务责任,转向成为安全提供者<sup>[14]</sup>。而美国也更热衷于扮演幕后推手角色,为了降低其维护霸权的成本,在应对安全威胁时,美国在幕后撑台,将日本推至台前,利用并限制日本。一直以来,日本充当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马前卒”,可以说是以在前线“冲锋陷阵”换取其在日美同盟中的“平等”地位。然而日本也抱有与美国相似的心态,希望美国为其安全利益“抛头露面”,但在诸如钓鱼岛等涉及日本核心安全利益的问题上,当日本要求美国作出明确支持的表态时,美国虽然站队日本,却因担心在该问题上被日本牵连、过分刺激中国而与中国短兵相接,对日本的支持显得较为慎重。例如,在2021年2月23日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柯比表示美国支持日

本在钓鱼岛方面主权的主张,但仅在3天后就纠正说自己的言论是一个“错误”,表示美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日本也意识到这是美国实力衰退的表现,能够增强美国安全保护可靠性的只有美国实力的增长。然而,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的,如今美国的压倒性优势已经不在,实力相对衰落的美国势必要战略收缩<sup>[15]</sup>。在疫情影响下,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社会矛盾突出,经济发展呈负增长态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资源投入必将因此受到限制,作出的安全承诺能否兑现值得怀疑。

其次,在同盟自主性问题上,美国利用日本制衡中国的战略目的与日本追求战略自主性的目标也产生了冲撞。日本不断寻求在防务安全领域“自力更生”、增强战略自主性也带来了双方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从长期来看,追求和获得替代选项会增强盟友的自主性,进而导致盟友的独立性增强,支持庇护国对外政策的意愿下降<sup>[16]</sup>。日本提高自主性、实现国家“正常化”、成为政治大国和提升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的诉求已经在政策中得到一定的落实,尽管美国在表面上鼓励日本提高防卫能力以减轻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防务负担,但是一个过于独立自主的、不需要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日本并不符合美国的霸权利益。随着日本自主性的逐步增强,不断谋求填补美国实力下降带来的亚太地区“权力真空”,美日同盟的结构性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再次,在同盟防务责任分担方面,驻日美军费用分摊问题依然是导致美日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美日签订的驻日美军费用分摊协定于2021年到期,2019年美日曾就费用分摊问题开启谈判,特朗普提出了“成本+50”的计划,即盟友承担美国驻军全部费用以外再支付50%。实际上,日本承担的驻军费用在美国所有盟友中是最多的,而且近年来日本经济不景气,加之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在驻日美军费用分摊问题

上日方并未妥协,而是宣布在2021年度防卫预算申请中列入与上年几乎相同水平的2029亿日元<sup>[17]</sup>。现阶段美日两国国内都认为拜登也会要求日本增加驻日美军费用,费用分摊问题上的分歧仍是美日同盟强化的阻碍因素。

## 二、美日同盟战略分歧的成因

联盟战略分歧不仅受诸如时代背景、联盟成员与对手之间的不同政治经济关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还受到联盟内部因素的影响。不论领导人如何变化,国家间的关系都会受到一些具有稳定性和长久性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旨在分析个人影响因素以外的因素,对领导人的风格、执政党的战略选择差异等因素不做探讨,希望找出跨越时间维度的具有稳定性的结构性因素。就美日同盟而言,两国战略分歧的成因主要包括时代背景变化、战略思维差异、经济实力差异,以及地理位置的不同。

### 1. 时代背景变化

“威胁制衡论”认为同盟的建立是为了制衡威胁,在冷战时期,美日处于对抗苏联的同一阵营,在军事、安全等领域不断合作以抵御威胁。而随着冷战结束和国际安全环境的改善,美日同盟的战略分歧也逐渐凸显。首先,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和平意味着战争等传统安全议题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下降,联盟国家卷入战争的可能性降低,传统的安全诉求地位下降;发展则意味着经济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上升,国家间交往更加看重经济利益,国家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发展。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加深了联盟成员之间及其与非联盟成员国家甚至敌对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出现了联盟成员国在安全上依靠盟友却在经济上依赖非盟友的结构性矛盾。美日同盟是军事同盟,其功能难以完全满足日本寻求发展的主要目标,二者之间的经济缺乏互补性,甚至相互冲撞,造成了日本在

安全上依靠美国但在经济上依赖中国的局面,使日本陷入两难选择的尴尬境地。受这种“二元结构”的限制,日本在对华经济议题上往往站在自身立场,追求合作带来的现实经济利益,对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进行选择性的背离。另外,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国家间关系更加扁平化、去等级化,国家的主要目标都是促进自身发展,经济利益的相互交织导致联盟成员之间也存在竞争<sup>[18]</sup>。虽然在安全上,美日将中国作为防范的对象,但在经济上,中国却是美日两国勾心斗角的战场<sup>[19]</sup>。经济上的竞争关系为美日同盟的政治安全合作蒙上了阴影。

此外,随着国际权力的转移和中美实力差距的逐步缩小,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断加剧,尤其在特朗普执政以后,美国对华态度转变,从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转变为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更加看重位于排头的日本盟友遏制中国的价值,这也相当于为日本的安全作出保证,符合美日的共同利益。然而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不可或缺的重要盟友,日本不可避免地被中美竞争的加剧所波及,在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的同时,日本也陷入了“被牵连”的同盟困境。日本的战略选择必然要依据自身的国家利益,以我为主,在未来发挥更多的自主性<sup>[14]</sup>。

### 2. 战略思维差异

战略思维是指一套由国家战略决策体系内成员共同享有的、以稳定的战略价值观为基础的特定思维方式,以潜在的、复杂的方式决定着国家安全战略的行为选择<sup>[20]</sup>。战略思维受地理、历史、文化、政治的影响,对一国战略行为具有长期性影响,不会在短期内发生变化<sup>[21]</sup>。美日的战略思维因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而不同,在面对同一国际政治现实时的战略行为也不同。美日同盟战略分歧主要受到美国战略思维中的以下几个特征的影响。

其一,“使命观”和“例外论”是美国霸权思维的重要来源以及其制定霸权战略的精神动力。美国认为自己是所有国家都憧憬的“山巅之城”,具有领导全世界的“特殊使命”。因此美国必须拥有和保持最强大的实力来完成这一“使命”。这种实力以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为核心,不允许其他国家超过美国,任何国家赶上或超过美国都会损害美国的优越性和行使“使命”的合法性,任何一个变得强大的国家都会被美国视为威胁而遭到打压遏制,冷战时期的苏联、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都是如此。

其二,战略思维的二元对立的哲学基础使得美国带有竞争性和敌对性较强的特点。美国总是通过寻找敌对目标来维持民族身份和国家利益认同<sup>[20]</sup>,苏联的解体使美国失去了竞争对手,然而其冷战思维却没有随之消失,转而将中国作为竞争的主要对手。

其三,实用主义是美国制定战略的重要依据。美国在制定战略时,一切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和出发点,完全以美国的利益作为衡量的标尺,将是否符合美国利益作为发展对外关系的准则<sup>[22]295</sup>。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手段比较灵活,能够在兼顾长期战略的同时,依据现实来及时调整策略,为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可以转变对一国的态度和政策。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就经历了敌对封锁—缓和拉拢—接触加遏制—遏制打压的变化过程。

其四,均势战略的运用是其获得全球优势的重要手段。事实上,在世界各个重要战略地区拥有的符合美国利益的均势,构建和支撑起了美国的全球霸权。在欧洲表现为美国领导了主导欧洲安全机制的北约并利用英国牵制欧

盟,在亚洲则表现为通过结盟日本和拉拢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国制衡中国以维护其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

相较于美国战略思维中的“使命观”和“美国第一”的优越感,日本战略思维中的位置意识\*使得日本总是根据自身位置的相对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战略行为。历史上吸收中国文化、佩里叩关后向西方学习以及二战后与美国结盟,无不反映出日本向强国学习、与强者为伍的战略思维。日本作为地区性次强国家对美国的心态兼具了上位意识和下位意识,一方面保持着对美的下位意识,认识到以日美同盟为基轴、追随美国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好选择;另一方面自身实力的上升和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带来的位置的相对变动使日本对美国开始有一种上位意识,主要表现为其自主防卫意识带有一种“脱美”倾向<sup>[23]</sup>。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就认为日本的防卫方针依靠美国和联合国,是一个耻辱的方针。1991年,宫泽喜一提出,日本要加强外交独立性,与美国拉开距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sup>[24]</sup>。近年来,日本不断解禁集体自卫权,进一步表明了其提高防卫自主性的意图。

另外,强烈的危机意识使日本对周边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自古以来,日本作为一个落后和资源匮乏的国家,它是如此敏感,不得不把对外政策放在国家优先考虑的位置<sup>[25]</sup>。由于资源有限、国土面积狭小,日本对外部威胁具有强烈的敏感性和应对威胁的脆弱性,日本制定战略时通常把维护自身安全放在首位,站在自身立场、根据自身利益作出判断,并将此作为发展对外关系的基石<sup>[22]296</sup>。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和中国崛起的现实背景下,日本越来越怀疑美国长期驻足亚洲的能力和在美国在日本真

\* 位置意识是由等级观念派生的,这种意识使得日本人不轻易“越位”。位置意识包括上位意识和下位意识,上位意识决定了“上位者”的傲慢、欺压和控制,下位意识决定了“下位者”的谦虚、服从和顺从。参见廉德瑰,“位置意识”与日本战略文化的特点[J].日本学刊,2007(3):92.

正面临威胁时提供充分保护的能力。日本愈发担忧中国强大甚至可能超过美国后的政策走向,也愈发担心美国因实力衰退而退出亚太后东亚安全格局该何去何从。此外,在经贸领域,日本十分依赖中国市场,如若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极大地危及了日本的经济利益,日本必定会慎重考虑是否追随或多大程度上追随美国。

### 3. 经济实力差异

詹姆斯·莫罗指出,非对称性同盟的成员国的目的不对称,强国主要为了提高推行自身政策的能力,而弱国主要为了得到强的安全保护<sup>[26]</sup>。此外,非对称性同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同盟成员国实力不对称,联盟的两国综合国力差距悬殊,美日同盟就是典型的非对称性同盟。综合国力是指一国拥有的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控制和影响国际环境和他国意志和行为——的全部力量的有机结合<sup>[27]</sup>,是决定一国对外政策的根本性因素。而经济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和关键要素,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sup>[28]</sup><sup>183</sup>。经济因素能对包括有形的物质要素和无形的精神要素在内的综合国力的各个要素产生重要影响,冷战后其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因此,笔者在此仅选取经济实力这一具有根本性的要素来说明美日之间的实力差异对两国战略分歧的影响。

经济实力直接决定了国家实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一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各国都将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国家对外目标的核心。经济实力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经济利益追求,而经济利益的差异和矛盾往往是导致国际政治对抗与冲突的根源<sup>[28]</sup><sup>183-184</sup>,因此,对美日同盟而言,美日之间经济实力的不对称意味着两国不同的经济利益追求,也意味着不同的甚至冲突的对外政策和战略。进入拜登时代,美国在对华经贸问题上的态度并未缓和,主张联合盟友的经济力量一起遏制中国,然而日本在市场上依赖中国,不可能对华全方位脱钩,

也无法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事实上,美日之间的经济实力差异及其与中国的实力差距不同是两国对华战略分歧的重要成因。从GDP来看,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美国、中国和日本2019年的GDP分别为21.433万亿美元、14.28万亿美元和5.082万亿美元<sup>[29]</sup>,三者差异较大。美国有能力以超强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和支撑推行对华强硬政策,不惜破坏中美已取得的合作成果。相较于美国,截至2020年,中国已经连续十二年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sup>[30]</sup>,日本的对华政策更加重视现实的经济利益,希望恢复其亚洲经济“领头羊”的角色,强化自身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谈判能力。因此,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诉求,日本在日中联系紧密的领域将会对拜登政府的对华遏制政策继续施行选择性的背离。

### 4. 地理位置不同

同盟成员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地缘战略,地理位置差异导致同盟成员国的关注重点和对不同区域国家的政策不同,并由此产生战略分歧。美日两国的地理位置差异是其战略分歧的重要成因。

首先,地理位置的不同对美日两国对华安全认知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对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的军事实力增长感到担忧,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会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和军事存在意义,从而威胁到美国的全球霸权,因此美国是从其全球战略的视角看待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并由此制定对华战略<sup>[31]</sup>。而在日本看来,中国军事力量尤其是海空军力量的增强将直接威胁到日本的周边安全环境,是对地区秩序的挑战和阻碍日本谋求地区主导地位的不利因素,因此日本更关注本土和周边地区安全。

其次,距离的不同影响了美日两国的对华安全态度。美国远离战火和纷争不断的欧亚大陆,与之相邻的都是没有实力或意愿损害美国

利益的国家,而且远距离军事投射能力的限制使得中国的军事力量对美国本土威胁有限,这些客观情况都使得美国本土不易受到战争破坏,因此美国对华安全态度比较强硬。日本虽不与任何亚洲大陆国家接壤,但作为亚洲的一个岛国,其安全又深受亚洲国家的影响。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国家对日本仍然保持警惕,日本在这一地区在政治上是孤立的。日本在亚洲不像德国在欧洲有法国那样的真正或多或少平等的地区伙伴国,也不像德国有波兰那样的虽然弱小得多但在地缘政治上却颇为重要的邻国<sup>[32]142-143</sup>。日本地缘战略聚焦于周边地区,对来自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潜在威胁更加敏感,消除威胁的迫切性更强。基于地理位置的临近,相较于美国,日本的对华态度较为谨慎和缓和。

再次,地理位置的差异导致了美日两国对同盟角色地位的定位差异。美日同盟建立之初就是美国为了借助有地缘优势的日本来遏制苏联的扩张,美日同盟虽然被美国视为其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同盟关系,但对美国而言,日本只是其有力助手,美日同盟只是实现美国全球地缘战略利益的工具。然而日本却将日美同盟看作日本的安全保障,希望在领土纠纷问题上得到美国的坚定支持,借助美国的力量实现自己的领土利益。日本的诉求与美国的支持并不完全匹配,加剧了日本对美国承诺可靠性的担忧。

### 三、美日同盟强化的尝试

在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美日同盟虽不乏战略分歧,但其作为双方实现各自利益和共同利益的重要工具,美日两国不会因现阶段的分歧而弱化甚至抛弃同盟关系,而是在诸多方面协调分歧、不断强化同盟。与特朗普不同,在新冠肺炎疫情和美国国内分裂的情况下,拜登作为传统的民主党建制派精英自就职以来不断强调要修复美国的“价值观同

盟”体系,重回多边主义,纠正上届政府的“错误”。拜登联合盟友应对中国崛起的主张和对盟友的重视缓和了特朗普时期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对美日同盟而言,这种对盟友重要作用的认知直接减弱了同盟的离心倾向,为两国分歧的协调带来积极影响。拜登上任以来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与日本进行了协调。

#### 1. 美日同盟加强对外战略协调

首先,明确对华指向性。作为军事同盟,美日同盟具有排他性,当双方强化对设定对手的共同认知时,同盟将得到强化而变得更加紧密。自奥巴马开始,美国总统上任后都确认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问题,凸显了美日同盟的对华指向性。此外,美国还明确了日本的重要性,不断通过在中国周边海域举行美日联合军演,释放两国合作制华的信号。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在对华战略上相对理性,但在安全领域美日同盟的对华针对性并没有因此减弱。自上任以来,拜登视修复上届政府留下的美日同盟裂痕为重大事项,明确针对第三方是强化美日同盟凝聚力的“良药”。2021年1月28日,拜登在与菅义伟首次通话时重申对日本防务的承诺,也再次确认钓鱼岛问题适用于该条约第五条。目前两国正在朝着写明钓鱼岛是规定美国防卫义务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第五条适用对象的方向展开最后协调<sup>[33]</sup>。不仅如此,拜登政府并没有声明反对中日使用武力解决钓鱼岛争端,也没有表明美国是否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持有立场,这一对日妥协的做法意在在该问题上偏袒日本以获得日本在美中竞争中对美国的支持。

其次,确认两国在多个议题上对华态度的一致性。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美日批评中国的《海警法》破坏了航行和飞越自由等合法权利。日本2021年版的《外交蓝皮书》中指出,中国军力增强及其在东海、南海的活动已经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和国际社会在安保上的

强烈关切事项<sup>[34]</sup>。在台海问题上,美日共同发表触及中美和中日关系政治底线的言论。美日“2+2”会谈后发表的声明中强调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sup>[35]</sup>。美日首脑会谈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又将“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写入联合声明中。拜登政府还推动“美日澳印+X”机制,展现出“台湾一旦有事”便集体作出反应的战略态势<sup>[36]</sup>。在国际秩序方面,美日共同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指出中国的行为“不符合国际秩序”<sup>[35]</sup>。在中国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美日打着人权的旗号干涉中国内政。总的来看,美日近来有关关注中国周边海域、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都释放出双方强化同盟关系、明确对华一致态度的信号,拜登政府未来将会继续在东海、南海和台海等问题上加强与日本的协调,进一步提高两国对华安全战略的一致性。

## 2. 美日同盟内部战略协调

首先,美日不断强化在多边框架下的防务安全协调——美日印澳四国安全机制。美日印澳四国安全机制在2017年底特朗普提出“印太战略”后重启,时隔十年重启安全对话是四国应对中国崛起的现实需要,也是美日同盟在多边合作框架下进行的重要战略协调。美国视日本为其印太战略的核心支点,将安倍推销的“民主安全菱形”打造为对华包围圈,通过构建四国安全机制强化美国与日、澳、印的双边与多边防务安全合作。四国强调共同维护印太海域的开放、自由和繁荣,是四国合作的利益基石<sup>[37]</sup>。至今其已在磋商机制化、后勤支持保障和情报共享等多个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sup>[38]</sup>。在这一机制下,四国还分别在印太海域多次举行联合军演,不仅意在提升四国军事作战的兼容性,还旨在“威慑”中国。美国推动构建这一机制不仅能够强化由美国主导的、以美日同盟为中心的亚太同盟体系,还能够提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和威慑力<sup>[17]</sup>,增强对华战略竞

争的优势。拜登就职后继承了这一政治“遗产”,2021年1月28日,拜登在与菅义伟首次通话时就肯定了美日同盟作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基石的重要性<sup>[39]</sup>。拜登明确表示将推进这一美日主导下的安全合作机制,并已经与菅义伟在推进印太战略上达成共识。日本新版的《外交蓝皮书》也强调日本就印太构想已经与美欧各国取得共识,将进一步推进四国安全机制框架下的合作<sup>[34]</sup>。拜登未来将继续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化、常态化,并使之走向准军事联盟<sup>[40]</sup>。总的来看,虽然美日各怀心思,但美日在双边安全合作外构建多边框架下的安全合作机制无疑将增加两国安全合作的渠道和平台,增强其安全领域的协调能力,加大其安全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其次,美日继续强化在三边框架——美日韩三边关系下的防务安全协调。战后,美日、美韩同盟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具有重要作用,美韩同盟具有地区意义,而美日同盟兼具地区和全球意义,美国的在韩陆军与在日海空军亦能在战时互补<sup>[41]</sup>,因此,加强美日韩三边合作将提高美国参与亚太地区事务的效率。然而特朗普对日韩的态度差异导致了美日韩三边关系的冷淡,拜登执政后将修复亚太同盟体系作为外交重点,不断改善这一现状以服务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2021年4月举行的美日韩三国国安部门首长会议和三国军方参谋长会议就朝核问题进行了密切协商;在5月举行的七国集团伦敦外长会议上,三国讨论了对朝政策的合作方案。除就三国的共同利益关切进行协商外,拜登政府还意图靠价值观外交强化美日韩三边关系,提出要加强民主国家之间的团结。

再次,美国默认日本加强与美国其他盟友的合作。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日本积极探索自主之路以减轻对美国的单一依赖,积极拓展“第三空间外交”<sup>[42]</sup>。在美国的默许下,日本寻求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合作,在“印太战略”

背景下推动构建新日英同盟,2021年5月还在日本海域与法国和美国举行联合军演。日本在2017年与澳大利亚签署了《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议》,2020年底双方在大框架上达成了《互惠准入协定》,加强了两国防务合作的深度<sup>[17]</sup>。美国默许日本以美日同盟为基轴拓展外交空间,不仅能够满足日本提高自主性的诉求,也为美日同盟向网络化发展提供了条件。

#### 四、结语

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的,“一个经济上强大的日本,特别是一个同美国竞争的日本,不可能只是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延伸而同时又回避任何国际政治责任。一个政治上有更大影响的日本,特别是谋求国际社会承认的日本,不可能在影响世界和平的更关键的安全问题或者地缘政治问题上回避表明自己的立场”<sup>[32]144</sup>。自建立之日起,美日同盟就蕴藏着分歧,后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上升,日本谋求国家“正常化”、成为政治军事大国与增强自主性的愿望愈发强烈,美日同盟的战略分歧凸显,两国在对华安全认知、战略应对和防务责任分担等方面龃龉不断。然而这些分歧只是美日同盟持续强化过程中的“插曲”,难以撼动美日同盟的根基,从目前来看,美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仍大于分歧。随着拜登政府修复同盟关系的努力、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和四国安全机制的发展,美日将在双边和多边框架下不断加大同盟强化的深度和广度。

#### 参考文献:

- [1] WALT S M.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2] 陶文钊.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J]. 美国研究, 2015(4): 9.
- [3] SNYDER G H.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0(1): 103.
- [4] LEEDS B, RITTER J, MITCHELL S, et al.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1815 - 1944[J].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002(3): 237.
- [5] 吴怀中. 战略分歧与日韩关系困局[J]. 国际问题研究, 2020(5): 77.
- [6] 周建仁. 战略分歧、自助能力与同盟解体[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1): 67.
- [7] 拜登上任以来首场新闻发布会: “不寻求与中国对抗”, 但声称“不会让中国超过美国”[EB/OL]. (2021-03-26) [2021-05-11].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2SULubvtop>.
- [8]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EB/OL]. (2021-03-03) [2021-05-1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
- [9] 王秋怡. 美国对华政策转变及中国的战略选择[J]. 和平与发展, 2021(2): 83.
- [10]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Remarks in a Town Hall Meeting with Anderson Cooper of CNN at PNC Field in Moosic, Pennsylvania [EB/OL]. (2020-09-17) [2021-05-11].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town-hall-meeting-with-anderson-cooper-cnn-pnc-field-moosic-pennsylvania>.
- [11] BIDEN J 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 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J]. Foreign Affairs, 2020(2): 64.
- [12] 吴心伯. 拜登执政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J]. 国际问题研究, 2021(2): 34.
- [13] 细看美日同盟“新高度” [EB/OL]. (2021-05-06) [2021-05-11]. [http://www.xinhuanet.com/globe/2021-05/06/c\\_139928219.htm](http://www.xinhuanet.com/globe/2021-05/06/c_139928219.htm).
- [14] 包霞琴, 崔樱子. 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制度化建设及其特点: 兼论日本在同盟中的角色变化[J]. 日本学刊, 2019(1): 19.
- [15] 米尔斯海默. 大幻想: 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M]. 李泽, 刘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 [16] BRIAN B. Promises under pressure: Statements

- of reassurance in US Alliances[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20(4):1017.
- [17] 吕耀东. 拜登政府与美日同盟的发展趋向[J]. *当代世界*, 2021(2):25.
- [18] 任琳, 郑海琦. 联盟异化的起源[J]. *国际政治科学*, 2021(2):33.
- [19] 廉德瑰. 日美同盟实相[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176.
- [20] 赵景芳. 美国战略思维与霸权战略选择[J]. *太平洋学报*, 2011(7):29.
- [21] 吴昊. 美国战略思维中的“使命观”[J]. *国际政治研究*, 1998(2):84.
- [22] 尚书. 美日同盟关系走向[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9.
- [23] 廉德瑰. “位置意识”与日本战略文化的特点[J]. *日本学刊*, 2007(3):92.
- [24] 苏若林, 唐世平. 相互制约: 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J]. *当代亚太*, 2012(3):5.
- [25] PYLE K B. Author's response: The primacy of foreign policy in modern Japan[J]. *Asia Policy*, 2007(4):209.
- [26] MORROW J D.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1(4):904.
- [27] 邢悦, 詹奕嘉. 国际关系: 理论与历史与现实[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203.
- [28] 陈岳. 国际政治学概论[M]. 3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29] GDP(现价美元)- United States, China, Japan | Data [EB/OL]. (2021-05-01) [2021-05-11].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US-CN-JP>.
- [30] 参考智库. 《日本经济蓝皮书 2020》发布[EB/OL]. (2020-09-11) [2021-05-11]. <http://www.cankaoxiaoxi.com/zhiku/jgwz/2020/0911/2420408.shtml>.
- [31] 凌胜利, 方寅旗. 共识下的游离: 美日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分歧[J]. *日本学刊*, 2019(2):46.
- [32] 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M].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33] 日美首脑会谈联合文件拟写明“尖阁”适用安保条约[EB/OL]. (2021-04-02) [2021-05-11].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1/03/4c23e8354e5c.html>.
- [34] 日本外交蓝皮书“强烈关切”中国军力增强[EB/OL]. (2021-04-27) [2021-05-11].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1/04/df7e1cbc2e31.html>.
- [35]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U. S. - Japan Joint Press Statement [EB/OL]. (2021-03-16) [2021-05-11]. <https://www.state.gov/u-s-japan-joint-press-statement/>.
- [36] 张文宗, 张磊. 特朗普政府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的危害: 兼论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J]. *和平与发展*, 2021(2):1.
- [37] 张洁. 美日印澳“四边对话”与亚太地区秩序的重构[J]. *国际问题研究*, 2018(5):59.
- [38] 韦宗友. 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新动向及其影响[J]. *当代世界*, 2020(12):44.
- [39] The White House. Readout of President Joseph R. Biden, Jr. Call with Prime Minister Yoshihide Suga of Japan [EB/OL]. (2021-01-27) [2021-05-1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1/27/readout-of-president-joseph-r-biden-jr-call-with-prime-minister-yoshihide-suga-of-japan/>.
- [40] 兰江, 姜文玉. 拜登政府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构想述评[J]. *南亚东南亚研究*, 2021(2):16.
- [41] 王俊生. 美日和美韩同盟: “弱军事化”为导向的考察[J]. *云梦学刊*, 2021(5):16.
- [42] 高兰, 赵丽娟. 中美夹缝中的日本“第三方力量”外交政策分析[J]. *日本学刊*, 2020(6):22.